

陈嘉庚报刊活动述评

张勇

(厦门大学 新闻传播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关键词] 陈嘉庚; 爱国主义; 言论; 新闻自由

[摘要] 陈嘉庚(1874-1961)是中国爱国华侨领袖,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他一生热爱祖国,立志为社会进步服务。他团结广大侨胞,支持抗日战争,反对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毛泽东同志曾誉他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他创办的《南洋商报》和《侨报》是两份新加坡华文报业史上非常重要的报纸,作为一名报业资本家,他的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对其报纸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一以贯之的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这两份报纸,来理清陈嘉庚的报刊活动历史。

[中图分类号] G219.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25(2007)02-0069-05

回顾上世纪东南亚华文报业的历史,《南洋商报》和《侨报》是两份必须提及的报纸,它们是华侨报纸的代表,曾分别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作为华侨社会的舆论宣传阵地,为华侨社会传播信息,沟通华侨社会与祖国的关系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两家突出的华文报纸的创办人都是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东南亚华侨史上,甚至于亚洲近代史的一位杰出的社会与政治领导人物。

正如有学者所言,“陈嘉庚是一名多方面的杰出人物”。研读史料和相关研究文章,我们不难发现陈嘉庚传奇人生的多重身份。他被誉为“菠萝大王”、“橡胶大王”的东南亚工商巨子,是“毁家兴学”全力支持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的教育家,是领导东南亚华侨抗击日寇、活跃在东南亚华侨社会政坛的

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相比而言,他一手创办《南洋商报》和《侨报》的报业资本家身份却少有著述涉及。陈嘉庚的一生处在亚洲区域的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大时代背景下,他的思想与实践经历了东西方文化的影响和锤炼,作为一名民族资本家,反映在政治上同时具有保守与进步的两面性。本文试图从这一支线入手,考察陈嘉庚的报刊活动,

一、陈嘉庚的办报动机

从宏观的视角上看当时整个华文报刊的状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37年“七七”事变中的20年,海外华侨增加到1000万左右,其中800万分布在东南亚地区^[1],这一时期,各侨居地华侨学校普遍设立,华侨的文化程度明显提高,尤其是华侨经济

[收稿日期] 2007-05-17

[作者简介] 张勇(1983-),女,安徽芜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2005级研究生。

力量迅速增长,为华侨报刊的出现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20世纪20年代,虽然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但陈嘉庚旗下的实业仍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他高瞻远瞩,以精明的商业头脑及时出让了借以起家的菠萝园,率先进入了橡胶业。自1913年开始筹办集美小学起到1921年厦门大学正式开学,陈的公益事业已进入了一个高峰期。正是在1923年,陈被推选为“怡和轩俱乐部”总经理,他更是试图把这个“百万富翁俱乐部”的组织加以改造,成为团结侨领,领导侨众,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和慈善活动的中心。应该说,陈雄厚的经济实力为他热心公益社会活动的行为创造了条件,而这一系列活动也使他的社会声望与地位日益提高,为日后成为万众瞩目的侨领打下了坚实基础。而在这一年诞生的《南洋商报》正是这一切条件成熟的产物。

有人认为陈嘉庚是出于经济获利的考虑萌生办报的想法。“产品常年所用的标帖、单据的印刷数量很大。让人家来承印,在生意算盘上当然是划不来,又为了推销商品而需要向报章刊登广告,这又是一笔很大的开销。陈先生觉得,如果自己办一张报纸,为自己的产品做广告宣传,这笔庞大的广告费,也自然由自己的报馆赚回去,常年所印的标帖、单据也就不必依赖他人的印刷馆了。”^[12]

可是,创办一份报纸,从启动资金、人员开销到日常供给,无不是一项巨大的开销。这样简单地入手考察陈的办报动机,有“只见树木,不见树林”之虞。在很多研究陈嘉庚生平的文章中,都曾提到过陈登报征求《验方新编》的事情。《验方新编》是陈嘉庚年轻时在友人处发现的一本书,他联想到家乡乡村中缺乏医生,如果每村中备有这样一本书则裨益不少。初版之后,陈又想再次广集国内和南洋的良方以增补原书的不足。为此,陈嘉庚分别在天津、北平、汉口、郑州、南昌等各大城市登报广求药方。登报一个多月之后,他便收到了来自中外的1000多个药方^[13]。此次登报征求药方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使陈嘉庚对报纸的社会功能有了一次深刻的体验。如果说《验方新编》是陈在出版业初试啼声,那么创办《南洋商报》则是真正意义上入足报纸出版业的开始。陈嘉庚的办报动机应该是充分认识到报纸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的结果。

考察陈在《南洋商报》创刊号上的《南洋商报开幕宣言》(《实业与教育之关系》)^[14],能很清楚地理清

陈办报动机的脉络。陈把《南洋商报》定位于一份商业性华文报纸。他认为“我国商业之不振,推原其故”,“所稀缺者有,商人不知商业原理与常识耳”,而解决的办法“其莫善于兴学”,而教育又与实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实业也,教育也”。即使是这样一份商业性报纸的发刊词中,陈也念念不忘时时阐明教育的重要性,对此,他认为教育与实业的关系是互为手段和目的的,而其终极目标,则是“欲求兴国之根本”。陈的办报理念由此可见一斑。报业作为陈实业体系中的一部分,是一块爱国主义的表达阵地。陈认为“兴学即所以兴国,兴国即所以兴家”,这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在同时代的资产阶级中可以说是相当先进的了。即使是在今天的媒介经营管理中,仍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与其苦心孤诣,一意独立,介如大声疾呼,广招群应”,于是,《南洋商报》便成了陈最佳的“疾呼”阵地。

二、陈嘉庚报刊活动的特点

(一) 报纸倾向转变见证陈嘉庚政治立场的转变

1940年在陈嘉庚的人生中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这一年6月,他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回国慰劳,沿途考察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等10多个省份,此行一方面是慰劳抗战军民,另一方面是考察国内抗战情况。在突破重重困难实地视察延安,并与毛泽东、朱德会晤之后,陈嘉庚把国民党统治区与共产党的根据地相比照,经过深思熟虑,他得出结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15]。这是陈嘉庚思想认识上的一大飞跃,对于长期以来与蒋介石私交甚好的陈嘉庚来说,这样的飞跃是建立在准备好付出代价的基础上的,这代价包括个人财产乃至身家性命。

抗日战争初期,陈嘉庚旗帜鲜明地支持蒋介石领导抗战,多次以“南洋总会”主席名义,为抗战筹款,曾以为蒋祝寿之名,一人捐赠了13架飞机。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刚成立之时,陈为《南洋商报》手定规则:“拥护南京政府为首要目的”^[16]。陈认为“应当服从中央政府”,理由是“特念外国已经承认,国民应当服从”。究其原因,这是陈怀有的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传统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经过连年征战、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中国对内对外都迫切地需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式的政府。于

是,当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陈立刻表现出了积极的支持,乃至把“支持政府”作为办报首要的编辑方针。当时国内社会生活的主题是抗日救亡运动,共产党的势力仍在发展壮大中,再加上“无党无派”的指向,《南洋商报》的立场倾向的表现总体上是温和超然的。虽然陈的办报宗旨是“开通商情,不涉及政治党派”,“身为南洋商报创始人的陈嘉庚先生对于敏感的政治和党派问题,更是十分小心”^[7],不过这种立场只是表面功夫,《南洋商报》对国共的基本态度,是袒护国民党的,“说的平和一点,是中间偏右的”^[8]。从报纸的倾向来看,《南洋商报》是偏向国民党政府一方的。

1932年,《南洋商报》改组为“南洋商报有限公司”,陈嘉庚的女婿李光前成为新任董事会主席。此后,《南洋商报》仍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陈的言论喉舌的角色,《陈嘉庚倡建闽南十年计划》、《星华筹赈成立之侨民大会上的演词》^[9]等,有关陈嘉庚的言论报道仍见诸报端。但随着1940年后,陈嘉庚看穿国民党反共的面目,加深对共产党的认识后,陈的政治立场从拥护蒋介石转变为拥护共产党。而《南洋商报》由于股权更转和反动文人控制编辑部,走向了“反陈”的一面。

陈嘉庚避难于印尼爪哇三年,安全归来后,于1946年11月21日创办了《南侨日报》,尽管这份报纸存在的时间只有三年10个月,却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它被公认为“民主堡垒,和平先驱”。创刊三周年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均题词表示祝贺。《南侨日报》与《南洋商报》最显著的不同点就在于,创刊时亮出了“反蒋拥共”的原则立场。陈嘉庚在创刊号《致读者》中说到:“我海外华侨本爱国真诚求和平建设,兹故与各帮侨领,创立《南侨日报》,其目的在团结华侨,促进祖国之和平民主。俾内战早日停止,政治早日修明,国民幸福早日实现。以达到国父建国之主旨。”^[10]陈嘉庚在《南侨日报》上发表了众多言论和演讲词,如《吾国将蒋必败》等,从标题上看,就旗帜鲜明地反映了他的政治立场与思想倾向。

《南侨日报》以充分篇幅报道了陈领导华侨群众进行的三次有历史意义的斗争,即支援祖国学生反内战、反饥饿运动,抗议白思华报告书和反对荷兰惨杀华侨并杀船劫货、封锁贸易的暴行。

从《南洋商报》到《南侨日报》,报纸的倾向转变见证了陈嘉庚政治立场的转变,由此又可见陈嘉庚个人对这两份报纸产生的影响和他重视报刊宣传

的程度。被烙上“陈氏”印记的报刊忠实地履行了传播陈政治主张和重要言论的职责,因其中介,使陈对当时华侨社会的文化、政治发生的影响更加深远。

(二) 重视报刊言论作用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中国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其最主要的标志是涌现出推动变法的维新派报刊和鼓吹革命的革命派报刊,进而形成了一个新名词“政论报刊”。到了20世纪20年代,虽然时隔已久,政论报刊对华侨社会的影响仍在,如新加坡第一份华文日报《叻报》和《南新报》、《日新报》都是维新派报纸,而革命党人办的报纸有《图南日报》、《南洋总汇报》等^[11]。直到1923年《南洋商报》的创刊,新加坡才出现第一份比较纯粹的商业华文报纸。

沿着近现代史上中国专门办报思想形成的轨迹循察,“日报立言”的实践和思想一直是主导推动力量,尽管它是以或明或晦的形式存在的,从早期的王韬、郑观应,到《伙公报》开创的“文人论政”,重视言论俨然成为一条报业遵守的定律,虽《南洋商报》不提倡“论政”,陈嘉庚在其报刊活动中也十分重视言论的作用。

杨进发编著《战前的陈嘉庚言论与史料分析》一书中共收录陈嘉庚言论56篇,其中有46篇是发表在《南洋商报》上的,涵盖了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内容。其中有22篇演讲词,其余为电文、记者访谈和撰稿等。由此可见,《南洋商报》在陈嘉庚的社会活动中扮演了“传声筒”的角色,陈也通过对时事发表观点鲜明的言论,借由报刊舆论阵地,进一步扩大他的社会影响力。这些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也为后人研究陈嘉庚生平和当时的社会面貌、考察华侨社会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原始资料。由于陈氏“无党无派”的政治主张,《南洋商报》是严守中立的商业性报纸,陈发表在《南洋商报》上的言论文章仍是围绕他“实业救国”的思想展开,没有或很少涉及政治主张的内容。

相比照《南洋商报》有意淡化政治色彩的做法,《南侨日报》的表现几乎是360度的大逆转。在《南侨日报》中,陈嘉庚更是亲自撰写了许多专论,如《在新加坡侨民大会上的演词》(1947年2月27日),《白思华报告书》内关于华人事上英国陆军部备忘录》(1948年3月13日),《评蒋鼎文之谈话》(1947年2月),《新中国必能兴利除弊》(1949

年3月17日),《与美国记者马斯特逊的谈话》(1949年2月23日),《复毛主席电》(1949年2月10日)等,都在社会上产生重要影响。

陈嘉庚的言论文章,达到了内容与逻辑形式上的统一,文辞流畅而极富感染力,这归功于陈幼时入塾读书九年打下的深厚根基。他的言论文章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善于旁征博引,增加论证的思辨力。

(三) 善于发现和利用办报人才

总结《南洋商报》和《僑侨日报》的成功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陈嘉庚在其报刊活动中善于发现办报人才,并能委以重任。

尤其是从策划到正式创刊仅用了两个月时间的《僑侨日报》,创下了海外华文报刊的一个奇迹。陈嘉庚任报社董事会主席,胡愈之主持笔政。整个编辑部班子不到20个人,每天报纸版面却有四开八大版,近八万字的工作量,团队工作效率之高令人惊叹。这支精干团队的组成,很大程度上是仰仗陈嘉庚的声望和胡愈之的办报经验。

陈嘉庚和胡愈之的交往由来已久。早在30年代,陈嘉庚就阅读过胡主编的《东方杂志》,还向该报投稿,他对胡的才华和文笔尤为赞赏。1940年,受周恩来的指派,胡愈之来到《南洋商报》帮助主持编辑部,而傅无闷得以专心经理事务。从此,胡愈之的到来使《南洋商报》无论在编排还是在内容上,都给读者以耳目一新的感受,胡的政论文章把《南洋商报》带入了一个高峰阶段。陈曾对《南洋商报》同事说:“报社深庆得此人。”^[12]陈嘉庚总是将胡愈之当作座上宾和好朋友,几乎每星期六胡都应邀到怡和轩与陈相会。因为陈嘉庚习惯讲闽南方言,而胡愈之说的是普通话,因此需要有人帮助沟通。对他们每次谈话,双方都感到是一件乐事,胡愈之十分钦佩陈嘉庚的为人处世和爱国精神,陈嘉庚也非常佩服胡氏的才华和学问,彼此友谊日益加深。

三、陈嘉庚的新闻思想

从严格意义上讲,陈嘉庚并不是一个职业报人,但在其参加办报活动和为报刊撰稿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自己的新闻思想。在陈嘉庚不同的文章里,尤其是《僑侨回忆录》中,往往谈到对新闻事业办报活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的特点,这些散布于不同地方的零星思想,又是归结于他的爱国主义思

想框架内的,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抽萃整理后,可以把他的新闻思想总结为以下两点:

(一) 提倡新闻自由

追求新闻自由的口号在早期民主革命者和封建统治者作斗争时就已经提出来了,在漫长的封建统治时代,无数仁人义士为争取这一神圣的权利前赴后继地奋斗。陈嘉庚在其办报活动中也曾数次公开对统治者禁锢言论的行为表示不满,为争取宽松的舆论环境和理想中新闻自由作出努力。在归国访问期间,他与《中央日报》王经理谈话^[13],问到为何最有权威的《中央日报》“每日出版仅八开纸一张,较之新加坡每日四开纸六大张,仅十二分之一而已”,王回答原因有二,“一是经费问题”,“二为政府多守秘密,凡开会议案及其他有关系之事,多被禁止或被检察员删去”。陈嘉庚发出感叹,“政府及党部事事多守秘密,不做坏事,何累人知”,他认为这种“多守秘密”的理由是不足取的,其根本是因为政府有意在钳制言论自由。在接受范长江采访时,他再次提起这个问题,直截了当地质问:“此何能模范各省,开化民众。”

在归国访问期间,陈嘉庚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统治区内一面是金迷纸醉一面是饿殍遍野的社会现状,而陈一旦发表真实的感悟或言论就不予发表,从容量和种类都少得可怜的报纸上也无法窥见社会的全貌。与之相比,新加坡社会的言论环境更为宽松,华文报刊的先进程度和发展势头也远高于国内,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陈对国内报业的怪状感到深深不满,以至于在其《僑侨回忆录》中屡次提及此事。在具代表性的《南洋新闻界》^[14]一文中,他详细地将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和新加坡的报业做比较,从侧面表达了对国民党统治钳制言论自由的不满,批评国民党管制下出版的报纸既小又少,新闻消息贫乏,以及言论不自由等弊端。

《僑侨日报》所处的舆论环境同样受到英殖民地当局的钳制,由于它以鲜明、激进的姿态高举民主旗帜,英当局一再加干涉,从1948年6月英殖民地当局宣布实施“黑色法令”后,《僑侨日报》不断有职工被捕。陈嘉庚针对此事在公开场合对记者发表谈话时说:“在殖民地政府的统治下,我是遵守法律的,但这法律必须是平等待遇的法律。”他希望新闻自由能作为公民权利的一种,纳入法律规定的范畴内,但在英属殖民地的社会气候下,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随着矛盾日趋尖锐化,1950年7月21

日社论《言论自由受到侵害》，最后两句无疑是石破天惊地发出了呼告：“全世界都知道英国政府这种举措是什么性质的，都看清楚英国标榜的民主是什么样的东西。”终于，英方强制封闭了《南侨日报》和其子报《南侨晚报》，陈嘉庚的第二次办报活动，在追求新闻自由与统治者做斗争中以失败告终，但这失败因其抗争而具有了进步意义。

(二) 以爱国主义和社会责任为办报主旋律

尽管身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员，陈嘉庚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认识受到了阶级局限性的限制，经历了从对国民政府抱有幻想到一步步走上反蒋拥共道路的转变。但由历史性的角度观察他的报刊活动，可以发现陈嘉庚一直是将爱国主义和社会责任作为办报主旋律的。这里的爱国主义最根本的是同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抗日战争时期，《南洋商报》为发动广大侨民关注国内战事，为抗战筹款，沟通华侨社会和祖国之间的信息交流发挥了巨大作用。解放战争期间，陈的爱国主义表现在反对美蒋勾结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支持人民解放战争，这种思想反映在《南侨日报》上，它是国共谈判破裂、内战开始时期华侨社会出现的一面民主旗帜，为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大声疾呼。如果说爱国主义的情操更多地体现为一份报纸的报格，那么在实践领域则表现为自觉地承担社会责任，陈曾在文章中点明“报纸为舆论喉舌，责在开化民智”^[19]，他曾身体力行撰写并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住屋与卫生》，帮助民众认识讲究卫生的重要性。国难深重时，华侨社会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南洋商报》披露奸商偷运日货的新闻，后来招致报复，奸商雇人下毒手放火焚烧了陈的橡胶厂，但他不为所动。1938年10月，针对汪精卫准备与日本言和，陈嘉庚发出“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的通电，这个通电作为提案获重庆国民参政会通过，他并在《南洋商报》上广为宣传，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动摇分子的投降活动。

正如前文所述，陈嘉庚并非一个职业报人，他的角色定位更符合一个报业资本家的标准。而实际上，摒除“利”的追求，我们考察《南洋商报》与《南侨日报》更多看到的是对“义”的探求。陈嘉庚和他所办的报纸这种紧密而微妙的联系，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却有着内在的统一逻辑，即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对陈嘉庚这样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伟大人物而言，身在南洋，着眼点不仅仅是华侨社会，受灾多难

的国内是其无可闪避的现实情境，一个有责任感的爱国人士是断然无法放弃对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一目标的追求，从《南洋商报》到《南侨日报》，正是这样一种“大爱”支撑着陈嘉庚的报纸信念。

[参考文献]

- [1]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 [2][7] 朱炎辉.南洋商报六十年[M].吉隆坡:(马)南洋报社有限公司,1984.
- [3] 吴庆棠.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M].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7.
- [4][9] 陈嘉庚.战前的陈嘉庚言论史料与分析[M].新加坡:南洋学会,1980.
- [5] 王毅林.中华英杰华侨领袖陈嘉庚[M].华侨领袖陈嘉庚,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 [6] 陈嘉庚.决定拥护中央[M].南侨回忆录,岳麓书社,1998.
- [8][11] 王慷鼎.新加坡华文日报社论研究 1945—1959[M].(新)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汉学研究中心,1995.
- [10] 张楚琨.陈嘉庚与南侨日报[M].华侨领袖陈嘉庚,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 [12] 曾昭铎.陈嘉庚与著名政治家胡愈之[M].华侨领袖陈嘉庚,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 [13] 陈嘉庚.与中央日报王经理谈话[M].南侨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1998.
- [14] 陈嘉庚.南洋新闻界[M].南侨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1998.
- [15] 陈嘉庚.范长江君来访[M].南侨回忆录,岳麓书社,1998.

更正

由于校对疏忽，本刊2007年第一期第22页“作者简介”中，朱慧玲女士的职务为“中国海外交流协会联络部副部长”，第26页“参考文献”注[14]应为“龙登高.美国华人经济：在边缘与前沿的成长……”第74页正文左栏第八行“梁金基先生”应为“梁淦基先生”。

特向当事人及读者致歉！

《桂侨刊》编辑部

2007年6月